

·书 评·

文/陈 巍

“第三种文化”在认知科学中的浮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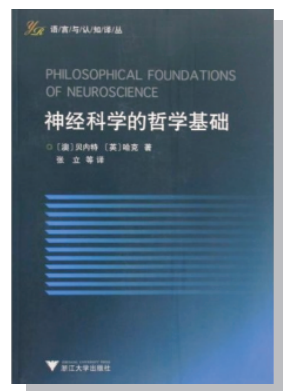
距 C·P·斯诺在剑桥里德讲座上的呐喊已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隔阂不仅故我,甚在加剧。而在 1964 年再版的《两种文化:一次回眸》一书中,斯诺已经开始反思“两种文化”这种非此即彼的提法,并且大胆预见未来可能会出现“第三种文化”(the third culture):“虽然现在谈第三种文化已经存在可能为时尚早。但是我现在确信它将要到来。当它出现的时候,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一些交流困难最终将被克服。”欣喜的是,在近期由神经科学家 M·R·贝内特和哲学家 P·M·S·哈克共著的《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一书中,笔者终于嗅到了一丝斯诺意义上“第三种文化”的气息。

人类的意识何来?这一问题与物质起源、生命起源、宇宙起源并称世界四大科学难题。正如认知神经科学家 A·达玛西奥感慨的那样:“还有什么比知道如何知道更困难的事情呢?正因为我们有意,才使我们能够,甚至不可避免地要对意识提出疑问,还有什么比认识到这一点更让人惊异和迷乱的呢?”而伴随后 3 个难题逐渐澄明,解开意识这一“世界之结”的重任就落在了认知科学家的肩上。认知心理学家 G·A·米勒将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定义为由哲学、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等为主体的六大分支组成。这其中前三者均为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科学,后两者则显示出自然科学性质,而心理学则兼具人文与科学性于一身。《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一书正是在认知科学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从本书的书名和作者的身份中,能感受到当前认知科学研究中对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关怀。但贝内特和哈克的工作又有别于一般意义上针对认知科学中某一具体领域的合作探索,而是希望“从科学和哲学的广博视角,对当代神经科学和心理学诸多理论中遇到的概念性难题作出全面的批判性述评”。就此意义而言,该书旨在为近 50 年来认知科学领域内有关意识现象的所有重要的理论假说、模型、概念与论据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其涉及的重要理论包括:克里克的神经还原主义、埃德尔曼的神经达尔文主义、达玛西奥的躯体标识说、丘奇兰德的取消主义、丹尼特的异质

现象学、塞尔的意识自然主义等;概念包括:知觉、视觉意象、意识经验、感受质、自我、自由意志等。这些努力尝试为认知科学摆脱 T·库恩所谓的前范式阶段(pre-paradigm),早日成为一门规范的、系统化的学科做好准备。那么为什么说意识研究需要一种斯诺意义上的第三种文化呢?答案虽略显沮丧,但却简单,那就是目前我们关于意识本质尚且知之甚少,在面对意识这一最顽固的堡垒时,就算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愿意摒弃前嫌,去通力合作,将人类已有的全部知识整合起来尚惟恐力有不逮,还怎敢再相互贬低和抵触呢?

具体而言,人文社会科学对意识研究的意义在哪里?早在现代科学诞生之前,人类意识起源和本质问题的探讨一直是哲学家的专利。“绝对的孤寂是灵魂无法躲避的命运,唯有我们的躯体才能彼此相见。”——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就曾为意识研究设下一个巨大的陷阱。这种基于思辨的逻辑推理气质一直延续到当代英美心灵哲学那里。我们知道,脑是意识起源的物质载体,不管是广义相对论还是量子力学,物理现象再复杂,都可用我们的智慧大脑来研究它,但是我们又怎样使用大脑研究它本身呢?这的确在认知科学研究的起点上便给了“当头棒喝”,又有哪位科学家敢于无视这样的反思呢?但幸好是,更多的哲学家采取的是更温和的立场,先将这个问题悬置了起来。阅读该书可发现,在当代认知科学的每一次重大研究发现和论证过程中,都少不了哲学家忙碌的背影。思想实验便是哲学家在意识研究中一直惯用的方法,如 J·塞尔反对“图灵测试”(Turing test)的“中文屋论证”(Chinese room argument)。认知科学的综合科学化(integrative science)取向,也愈发强调对数据(data)、理论(theory)和阐释(narrative)进行有机综合,而哲学家在后两个要素的思考上显然具有先天的优势。

另一方面,进入 20 世纪以后,伴随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意识逐渐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热门对象。意识过程的大脑活动“黑箱”,正在被正电子断层扫描术(PET)、脑电图(EEG)、脑磁图(MEG)、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先进科学技术



[澳] M·R·贝内特,[英] P·M·S·哈克
著,张立,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9 月第 1 版,定价:68.00 元

所打开。哲学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假设,也正在被科学家用科技手段予以直接检验。比如在传统哲学命题中,自由意志(free will)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我们是否具有自主决定某一行为的能力?如果有,这种能力又是通过何种具体机制实现的?神经科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探索。该书介绍了神经科学家 B·李比特的研究及其引发的争论。实验结果显示,大脑准备电位(preparatory brain activity)的出现比人有意识的选择运动早几百毫秒。李比特进而大胆预言“自由意志只是一个错觉”。该书还就某些严重困扰认知科学发展的重要概念进行了审慎的分析与批判,如感受性(qualia)——即感受到蓝色意味着一种怎样的特殊心理体验,经仔细追溯感受性问题的来源及各种支持感受性观点的论证过程,一一指出了其混淆、含糊与谬误所在,而不是简单予以反对和抛弃。虽然笔者并不赞同该书“只有将影响深远的概念混淆的阴影彻底驱逐,神经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的立场,或许意识本身的复杂性就决定我们无法简单的追求精密化,这也是心物的疆界之所在;但这毫不影响我们欣赏该书作者的论证态度:那种带有康德所谓“批判性反驳”的风韵——也是继承了自芝诺以来西方学术界就一个命题的“论证过程”重于命题本身的优良传统。在此种科学与人文互动的张力中,第三种文化正逐渐在认知科学的浪潮中浮现出来。

本文作者 陈巍,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博士研究生。

栏目主持人 尹传红,《大众科技报》主任
编辑,电子信箱:asimov@126.com。

(责任编辑 陈广仁)